

影响、相互作用与本地化

——2018年“基督宗教在中国”会议综述*

Impact, Interaction and Inculturation: A Review of the
2018 Conference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Society”

【意】罗木兰著 赵琳译

[Italy] Monica ROMANO

作者简介

罗木兰，宗座额我略大学传道学院讲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onica ROMANO, Lecturer,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Italy.

Email: monicaromano111@gmail.com

Abstract

First introduced into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over time Christianity has interacted with the existing philosophical, religious and ethical systems while attempting to indigenize and “sinicize” itself through a process of adaptation and inculturation, not without raising questions and posing challenges. Today, Christianity is among the fastest-growing religions in China but continues to be largely perceived as a “foreign religion,” despite its long history in the country.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Society: Impact, Interaction and Inculturation” held at the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on 22-23 March 2018 discussed these issues. Organized by the Faculty of Missiolog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Yuan Dao Study Center and of the Gregorian University Foundation, it gathered scholars and religious leaders from China, Hong Kong and various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panelists debated the theme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historical, religious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through a dialogical approach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teracting with an audience including researchers,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s, government officials, journalists, religious people, and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This review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main idea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which was the eighth in a series of annual conferences on 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main aim of this kind of symposium was to establish a platform of dialogue between academia, church leadership and government as well a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Keywords: Christianity, Catholic Church,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Culture, religion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各大宗教在中国的复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自唐代传入中国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程伴随着问题与挑战，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基督教与中国既有的哲学、宗教与伦理体系（包括儒家思想、道教、中国佛教以及鬼神和祖先崇拜的“中国民间宗教”）互动，同时通过适应和文化融入的方式努力将自身“本土化”与“中国化”。时至今日，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新教）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但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仍然有限。尽管基督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它仍然被认为是一种“外来宗教”。

2018年3月22日至23日，“基督宗教在中国：影响、相互作用与本地化”（Christianity in Chinese Society: Impact, Interaction and Inculturation）国际学术会议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举行，该会议提出和讨论的主题涵盖了上述所有问题。会议由额我略大学传道学院（Faculty of Missiology）主办，香港原道交流学会和额我略大学基金会协办。该会议汇聚了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欧美各国的学者和宗教领袖。论坛成员们从历史、宗教和社会学的角度，通过东西方对话的方式围绕基督教在中国的主题展开讨论，并与研究人员、外交代表、政府官员、记者、宗教人士以及额我略大学师生交流互动。该会议是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举行的“中国社会的基督教信仰”系列研讨会的第八次会议，旨在为学界、教界、政府及中西学者之间搭建一个对话平台。

会议第一天，额我略大学校长贡萨尔维斯教授（Fr. Nuno da Silva

* 本文为早前以意大利文和英文发表的两篇短文的增订版本。[This is a longer version of two shorter articles published earlier in Italian and English, namely: Monica Romano, “Il Cristianesimo in Cina: Impatto, Interazione e Inculturazione,” *La Gregoriana*, Anno XXIV, no.54 (2019):10-15; and Monica Romano, “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 Society: Impact, Interaction and Inculturation,” *La Gregoriana Magazine*, Year XXIII, Special Issue, no.53 (2018):24-26.]

Gonçalves) 及传道学院院长屈斯特教授 (Fr. Milan Zust) 致辞欢迎与会嘉宾, 罗马宗座外交部长拉加格尔总主教 (Archbishop Paul Richard Gallagher) 及香港荣修主教汤汉枢机主教 (Cardinal John Tong Hon) 为开幕主讲嘉宾。拉加格尔总主教在演讲中赞扬了中国在国际舞台和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以及中国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 并对耶稣会士为重新发现中国文化所做出的“非凡贡献”表示“深切钦佩”。拉加格尔总主教表示, 中国教会的使命是通过信仰的文化适应和融入, “使‘基督教世界’和‘中国世界’之间的相遇成果累累, 让教会成为“完全天主教的和真正中国化的教会”。汤汉枢机在演讲中强调, 中国社会和基督宗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群体, 各自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二者间的对话不可或缺。汤汉枢机认为, 对话、尊重、相互倾听和相互走近, 有助于“互相充实”“社会和谐”“和平共处”, 以及增进“对世界、对生活、对社会的新认识”。

在第一天上午的论坛中,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慧林教授以荷兰汉学家许理和 (Erik Zürcher) 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详细阐述了佛教和基督教这两个非本土宗教在中国的不同发展路径。许理和比较了佛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融入情况: 佛教慢慢地融入了中国文化, 而基督教至今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外国宗教。对此问题的两个“流行”解释是: 这是因为礼仪之争重创了基督教在华传教工作; 或者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 (Jacques Gernet) 的观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不相容。许理和不同意这两种简单化的观点。他认为这两种宗教在中国的不同遭遇和结果是因为它们在中国有不同的传播方式: 佛教采用了“自发扩散” (spontaneous diffusion) 的传播方式, 而基督教是“指导性传播” (guided propagation)。杨慧林教授点出了这两种传播方式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 佛教与儒家思想在中国积极互动、相互影响, 以玄奘为代表的中国僧人使用不同的方式在中国介绍和改写经文, 这些对佛教在中国的有效传播有重要帮助。来自海德堡大学的李克教授 (Marco Lazzarotti) 在回应中对此做了更多补充。他认为, 佛教与中

国的本土宗教和民俗有很多互动；而基督教传教士则更多与自己的母教会、教会领袖及身在欧洲的教皇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同教会的不同立场催生了各种不同的福音要旨（“kerygma”），造成分裂。这些都导致基督教与佛教相比在传播上未能取得有效成果。

在接下来的论坛中，来自复旦大学的魏明德教授（Benoit Vermander, S.J.）谈到中国领导层在海外引发争议的倡议——“宗教中国化”（sinicization of religions）。魏教授认为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具有其文化和社会政治意义，但是基督徒不应该仅仅因为这个建议来自政府而拒绝它，而是应该找到恰当的方式，积极回应、参与对话。魏明德教授强调，中国基督教信仰的“书写、社会和仪式表达”自17世纪开始就经历中国化的进程，其间伴随着大量的跨文化和跨宗教对话。不过，魏明德教授重申了此前的观点，即基督教在中国仍被视为一种“异端”，因此中国的基督教需要通过远离“自卫态度”（defensive attitudes）变得“更中国化”；放弃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文化；在与儒家、道家传统的对话中进行“精神文化融合”；通过艺术和文学与文化进行对话；并致力于更多的社会服务和行动。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在回应中指出，中国人对基督教普遍的负面态度在中国出现共产主义之前即存在，这应该归因于中国的精英学者们接受教育的西方文化环境。这些环境经历了去基督教化的过程，以科学和现代的名义反对基督教并敌视社会主义，这种环境塑造了今日中国中产阶级的心态，也使许多天主教徒在社会问题上陷入保守立场。

北京大学卢云峰教授的论文涉及了中国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数量问题。这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有着“复杂的政治和宗教考量”。他认为，虽然来自政府的信息可能会倾向于压低数据，但教会或一些海外团体更有可能会夸大数字。各种来源估计中国有两千万到1.3亿新教徒。卢云峰教授的演讲结合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結果，主要介紹了北京大學開展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該調查問卷中設計的問題不是固定答案，而是可以有多种答案，但同时为特定的宗

教定制了与其宗教活动相关的问题。这样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新教人口约为3800万人。额我略大学的约翰内斯·埃拉特教授(Johannes Ehart, S. J.)在回应中承认此类调查提出了一些挑战。他指出定量社会研究存在局限性,甚至是模糊性,并指出问卷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受洗是被认为是基督徒的唯一标准;宗教实践与宗教机构的关联;亚洲宗教经验的多样性和非排他性;和“无宗教”类别等。

在第一天的最后一个论坛上,来自伦敦大学的彼得·劳曼教授(Lars Peter Laamann),挑战了自“五四运动”兴起的一种“单一的、‘爱国的’和‘科学的’反对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主流观点。虽然外国传教士的确被中国知识精英视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劳曼教授认为因为传教士具有“技术知识”和“治病”的能力,大多数人其实是信任他们的。人们对传教士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或认为他们是“异域的魔术师”,或欣赏他们的“医学特长”。上海复旦大学的李天纲教授同意这一看法,认为反基督教运动在中国更多的是现代民族主义的结果,并认为中国学者应当“重新评估传教士在中国的作用”。

第二天上午的论坛以哥德堡大学的杨富雷教授(Fredrik Fällman)的报告开始。杨富雷教授从社会-政治、文化-知识和实践-传教的三个角度讨论了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互动问题。他指出,尽管中国一直控制宗教的体制,中国宗教在近几十年内还是获得了一些发展空间。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宗教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最近又倡导宗教“中国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这些要求旨在让宗教与“党一国”所定义的“中国性”“一致”,让宗教“淡化”为一种“道德化的信仰”。虽然适应是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强制要求”,但也为基督徒与中国社会的互动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四川大学的石坚教授辨析了“适应”(adaptation)“本土化”(indigenization)“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中国化”(sinicization)这四个常与本土化问题相关的关键术语,其中“中国化”是最近在“学界、政界与宗教界”被广泛使用的术语。石坚教授表示,“基督教还没有很好地融入

中国文化和社会”，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担忧，其外来身份和因信教而产生的大量异端邪教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

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副院长杨晓亭主教在演讲中结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论社会事务关怀》通谕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 以及《天主教会社会教义概要》 (*Compendium of the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介绍了中国天主教教会社会服务工作的进展，包括其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杨主教强调，社会服务帮助天主教会参与中国现代社会并发挥一定的作用和影响；让教会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融入中国文化并获得国家的认可。明斯特大学的克劳迪娅·冯·科拉尼教授 (Claudia von Collani) 在回应中探讨了16至18世纪中国人的需求以及欧洲基督教对这些社会需求的回应。她指出，当时的耶稣会士引进了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知识，开始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相适应的过程。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也制作了大量的宗教书籍，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社会服务。

华盛顿大学的魏杨波教授 (Jean-Paul Wiest) 回溯了基督教在中国经历的文化本土化历史过程，这个不断适应的过程从早期与东方叙利亚教会的互动开始延续至今。他指出了一些帮助基督教融入文化和传播的因素，即在当地社会网络中出现了本土传教士；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村民之间建立了和平关系；基督教强调宽恕和怜悯；建设天主教教育机构；在基督教灵修中加入中国宗教实践元素；以及基督教艺术和建筑本土化等。魏杨波教授认为，社会服务、对新闻和数字技术的利用、训练有素的平信徒、与中国的政治形势“达成共识”、以及“中国化”(只要它包含“同化”中国传统，达到“多元化和宽容”)是当代天主教发展的前进道路。山东大学傅有德教授在回应中强调，中国宗教确实与西方不同，它必须服从于政府。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会干扰“纯宗教事务”，而是政府和教会共同实践“爱国爱教”的原则。傅教授将教宗方济各关于文化多样性和本土化的必要性的讲话定义为“好消息”，认为这可以指引基督教走向“中国化”。

香港天主教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吴智勳教授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基督教中国化过程，并着重介绍了成功的故事和错失的机会。他明确指出，基督教信仰要在中国扎根，文化融合至关重要。基督教在中国经历了接受和拒绝的不同阶段，后者往往是由于它被认为与外来的帝国主义有联系。只要基督教与中国的精神和伦理传统对话，使自己适应中国的文化背景，同时呈现基督教的核心和普世信息(上帝的仁慈、爱和拯救的力量)，它就可以在中国人中间结出果实。吴教授认为基督教参与中国的主要“成功因素”是掌握了中文知识和尊重当地文化。耶稣会士撰写了大量著作，寻求与儒家思想在道德方面的共同点。与此相反，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包括传教士缺乏汉语能力和中国文化知识、在举行宗教仪式和培训神职人员时仅使用拉丁语、本土神学未能得到发展等。为了推进基督教在今日中国的本土化，天主教会应该参与宗教间的对话，鼓励平信徒参与福音传播，强调道德伦理和爱，宣扬上帝的“仁慈的救赎”。额我略大学讲师罗木兰博士(Monica Romano)在回应中指出，外国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遵循中国成熟的文本实践，在文本中国化的过程中做出了贡献。这一过程随着中国基督徒的参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也可以被视为中国神学发展的第一步。“基督教信仰的存续”包括很多因素：强大而富有活力的、扎根于农村的基督教社区；教会由下而上的本土化；以及与来自民间信仰的当地风俗融合等。当代中国天主教会的首要任务是强调以圣经为中心发展中国神学，开展普世教会和宗教间对话，与学术界和研究机构对话，宣扬和见证爱与恩慈的福音。

译者简介

赵琳，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助理编辑。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ZHAO Lin, Associate Edito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aolin1228@outlook.com